

中国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第十八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第十八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八辑/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059-7396-1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811 号

书 名	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八辑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396-1
定 价	43.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章培恒先生文学研究特点试析——从其杨维禎

新论谈起 孙小力 / 1

古今文学自纵横——关于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的

二三事 李 庆 / 24

见微知著——从若干序跋看章培恒教授的学术思想 张 勇 / 40

时代荡转 学人何为——章培恒师学术人生的启示 ... 许建平 / 59

“云”与“梦”地望略考——宋玉辞赋所云“梦”

和“云梦”地望论考之一 周尚义 / 75

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域外传播——以朝鲜半岛、

日本为中心考察 卢燕新 / 92

笑看浮云的了悟——论辛弃疾之园林词 ... 杨 雨 何淑滨 / 111

关于几位梁山好汉的绰号 石 麟 / 151

宋江及其起义军几个关键问题的新探考 李永祜 / 166

东平“水浒文化”的新诗证——新见两首咏

宋江诗 周 郢 / 203

天一阁博物馆藏《国朝英烈传》与历史小说

《皇明英烈传》	川 浩二 / 212
毕沅幕府与小说	倪惠颖 / 239
胡适批点本《文文山房集》的学术价值发见 ...	王思豪 / 255
“性灵”说在日本的流变	羊列荣 / 271
台阁体新辩	汤志波 / 295
李流芳西湖交游考	李 柯 / 315
诗僧的淡出与学僧的凸显——论近代僧人文学创作	
主体的更替	贾国宝 / 349
论民国女词人创作状态与观念的新变	曹辛华 / 390
频频“谒陵”为哪般？——晚年林纾的政治、文化	
心态解读	张俊才 / 410
辛亥武昌起义前后的黄世仲	颜廷亮 / 430
朱有燬年谱定稿	朱仰东 / 471
征稿启事	/ 544

章培恒先生文学研究特点试析

——从其杨维祯新论谈起

孙小力

近几十年来，针对中国文学史上相当一部分重要的作家作品，章培恒先生给予了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质的评价或解释，其中又以元明清时期的作家作品居多，例如“铁雅派”代表杨维祯、“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两拍”，《儒林外史》等等。这些当初令人耳目一新、或者使人颇感诧异的论说，最后往往又能获得广泛的认同，绝非偶然。今天我们从中选择“杨维祯”这样一个“麻雀”加以解剖，既能从新旧批评的比较之中，探求章先生为之翻案的原因和正名的过程，感受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明显差异，同时也能够窥知章培恒先生的兴趣所在，可以从中摸索章培恒先生的治学理念，梳理章培恒先生的文

学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不无裨益。

一、有关杨维禎批评标准的变化和章先生的新论

杨维禎（1296—1370），字廉夫，别号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元末诗文作家，铁雅诗派的领袖。有赋集《丽则遗音》，诗集《铁崖先生古乐府》、《铁雅先生复古诗集》，诗文集《东维子集》，史评《史义拾遗》等多种著作传世。

在章培恒先生有关杨维禎以及元明清诗文的评论出现之前，在整个二十世纪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著作之中，杨维禎是不受关注的；或者即使稍有涉及，但多持批评态度。然而同样就是这个杨维禎，章培恒先生却认为他足以引领时代，并且强调其诗文作品的价值几乎等同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好问的诗词，王实甫、关汉卿的杂剧，《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总而言之，是整个元代文学、甚至近世文学中最为杰出的一部分。

那么，在章培恒先生之前，杨维禎为何不被看好呢？章先生的评判与之前各家观点相比，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最为重要的，应该还是评判标准的差异，或者也可以说是评判角度的不同。

纵览章培恒、骆玉明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之前的20世纪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它们对于具体的作家作品以及各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判断，大致遵循以下两种标准：一是强调不同文学体裁的各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二是强调文

学的内容题材是否关注社会民众。

如果根据第一个标准来评判文学家及其作品，那么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即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文学史家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因此常常着眼于艺术形式方面的发明创新及其历史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作评判，杨维禎或者整个元代的诗文似乎永远也无法与唐诗宋文相提并论。

从有《中国文学史》开始，较早的文学史家林传甲就这样认为：“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素。……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文学史家胡怀琛，陆侃如、冯沅君，一直到建国以后的浦江清，观点也都比较一致。或者认为“这个时期中，除了他民族同化于汉族足以叙述而外，文学创作品只有戏曲，普遍称为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时代的特产，其他诗歌散文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② 或者干脆只对宋元话本、元明散曲、戏剧和小说加以评述，元明诗文则一概略去不提。^③

就俗文学的评判而言，上述文学史家其实可以分为两派，一贬一褒，截然不同。但是他们贬抑元代诗文的态度却高度

① 《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181—182页。上海科学书局，宣统二年六月再版。

②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第八章《辽金元的文学·辽金元文学变迁的大势》131页，民国二十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③ 如陆侃如、冯沅君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又名《中国文学史二十讲》，1932年8月杀青），只讲元明散曲、戏剧和小说，诗文则一概略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浦江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也只讲宋元话本、杂剧和南戏，而不涉及元明诗文。

一致：林传甲认为元代诗文的堕落是俗文学的影响所致，他认为诗文本该高雅，是因为遭受当时兴盛的俚俗文学的干扰，所以造成元代诗文的格调卑弱；陆侃如、浦江清等人则着眼于正统诗文与俗文学的价值比较，认为元曲、说部的光芒足以笼罩一个时代，当时的诗文根本不具有相提并论的价值和条件。

杨维祜以及元代诗文以往不被看好的第二个原因，是源于强调“阶级”、“革命”的文学史观。建国以后的文学史著作，除了分析艺术形式方面的创新和成就，更加注重思想内容的平民化和革命性，往往执着于文学的题材内容是否贴近下层社会，是否反映大众民生。这一类的文学史著作之中，余冠英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有关评述最具有代表性：

统观元朝一代诗文，没有杰出作品也没有出现杰出作家，很难说什么繁荣。他们的诗文总的情况是思想内容比较贫乏，感情也不够深刻。题材狭窄，很少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重大事件，最多的是题画咏花、应酬赠答、碑传题跋之类。这些诗文充满着个人肤浅的感受、感想和言不由衷的敷衍、吹捧。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反映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有不少也往往流于肤浅。缺乏热情和软弱无力。而在艺术上，概括性不高，多写琐

琐碎的事物，对生活体察不深，作品缺乏感染力。^①

此书初版于1962年，文革结束以后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又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上述有关元代诗文的评价，可以说是建国以后三十多年在这方面最具有权威性质的说法。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些生活上主张“闲适”、艺术上趋于“唯美”的诗文作家，自然也就很难进入文学史家的法眼。也正因此，以杨维禎为代表的元代诗文作家作品，也就长期、普遍地被轻视。^②

杨维禎之类的元代诗文作家作品长期遭受冷遇的现象，从作品的选编方面也可窥见一斑。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编纂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例如由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杨维禎没有文章入选，诗歌仅有两篇。选编者之所以认为杨维禎的诗歌还有一些可取之处，是因为他的乐府诗还是“揭露了一些社会黑暗”、《竹枝词》还是颇“有民歌风味”。^③但是仅此而已。

元季一度风靡东南地区的杨铁崖，后来少人问津，这样的现象其实由来已久。如果我们再往20世纪以前追溯，不难发现明清时期推崇杨维禎的评说，其实大多集中于所谓“人

① 《中国文学史》第八章《元代诗歌和散文》第一节《元代诗文发展的概况和特点》，799—8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版。

② 按：其实杨维禎反映大众平民生活的诗文也不算少。问题在于其部分作品后世无人整理出版而几近埋没，其有意宣扬的诗歌的“怪异”风格也掩盖了部分事实真相。

③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册《杨维禎诗》，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品”，是在仰慕杨铁崖明初遗老（其实是莫须有）的形象。很少有明清人士能够真正肯定杨维禎的诗文价值，其间似乎唯有王士禎独具只眼，其著名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如今也仍然脍炙人口。但是我们从“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这样的诗句中还是不难推测，王士禎之所以发此议论，是因为在他的和他以前的时代，元代诗歌（包括杨铁崖的作品）是遭到普遍轻视的。而且即使是王士禎，他对于杨维禎、吴莱为代表的元季诗歌的肯定，也还是局限于形式风格方面。

在20世纪的文学史著作中，类似王士禎的对于杨维禎诗文的褒奖也不是没有，一些文学史家对于杨维禎以及元代诗文还是作过一些正面的肯定。

例如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既有专章论述“元代杂剧”，也有专章评论“元明的诗词”，还设有专门一小节论铁崖诗，对其诗歌气势之壮阔、变化之奇突，给予过赞许。^① 采用“传统的方式”撰写文学史的钱基博，所撰元代部分（1940年前后所用讲义），相比之前、甚至之后的其他文学史著作均有所突破，论述元代诗文作家作品最多，且有专节论述杨维禎。

但是总体而言，而且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文学史家，都未能摆脱“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样的价值判断，或者“是否反映大众阶级”这样的是非标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侧重于后者，他认为元末诗人中，杨维禎享有盛名，

^① 《中国文学史话》，梁乙真著，元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出版。

但其成就则不如王冕：“散文比较通顺，诗歌缺乏现实生活的内容，多以史事和神话为题材，文字过于藻饰；尤其乐府诸作，故意在语言、格调中，出入卢仝、李贺之间，流为奇诡怪僻，而实际徒以矫饰求奇而已。”^① 二十世纪末台湾王忠林等人合著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评述元代诗词散文，所持标准则倾向于前者：“元代的诗词，虽然谈不到有什么辉煌的成就，而同散曲比起来，也自然逊色得多，但是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成就，尤其承继南宋末年文章凋弊之余，仍能力图振拔，自闢新径。以诗词的风格来说，颇不同于前代。”^② “元代的散文，仍是沿袭唐宋的古文发展，虽然不能有宋代那样辉煌的成就，但散文作家还是很多。”^③

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不变的评判标准，文学史家即使试图给予杨维禎（或者元代诗文）正面的肯定，总是显得那样的力不从心。上引王忠林等人所谓“诗词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成就”、“风格颇不同于前代”、“散文作家还是很多”之类的评述，是如此表面和苍白，几乎接近于空话。

概而言之，以往的文学史家认为，就诗文这一文体的历史演进而言，金、元以及以后时期的诗文永远无法企及唐、宋诗文的艺术和思想的高度，所以只能是一种必然的退步。那么，以杨维禎为代表的元代诗文作品，似乎理应被摒弃或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二章《元代的散曲与诗词》，815—8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重印。

② 《（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第六编《元代文学》第一章《元代的诗文》第一节《元代的诗词》，725页，王忠林、邱燮友等八人合著，台湾福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校订版。

③ 同上第二节《元代的散文》，743页。

轻视，又何以能、怎么能翻案呢？

章培恒先生全新的诠释，其标准和出发点则完全不同。针对“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一风行的价值判断标准，章培恒先生强调元代诗文的新变及其历史作用，他说：

在有些人看来，元明清诗歌在成就上不仅远逊于唐诗，而且也大大不如宋诗。但在实际上，元明清文学正是从宋代文学发展到“五四”新文学的必不可少的桥梁。自然，“五四”文学还吸取了异域的营养，但我国文学如不曾经历过元明清时期的虽则是缓慢的发展，而仍然停留在宋代文学的阶段，也就根本不存在吸取异域营养的前提。倘若有人认为“五四”文学只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怪胎，远没有宋代文学之纯正可爱，那自然无话可说，否则也就不能不承认元明清文学所具有的历史地位。^①

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方面着眼，章培恒先生认为元代诗文都比宋代有较大进步，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进步和新变，元代以及明清诗文事实上承担起了链接新旧文学的桥梁作用，成为宋代诗文向“五四”新文学发展期间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章先生进一步指出，对于文化人而言，戏曲小说仅仅是小道，不能代表文人士子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观念的主流，而且就这一点而言，诗文的新变比戏曲小说的演

^① 《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序》，载《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卷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进更为重要，因此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针对上述第二个标准，即以往文学史家从主题和思想内容方面对于以杨维禎为代表的“非主流作家”的贬抑，章培恒先生曾经有意无意地作出了回应。他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似乎颇为奇特的现象：当某一种文学样式的作者群仅仅是为娱乐读者（或听众、观众）而创作时，会出现不少好作品；但当其作者群赋予它以看来较为高尚的目的时，该文学样式的总体成就反而会降低。我想，这种现象恐怕就与文学的‘娱心’功能有关。^①

所谓“娱心”，不仅指娱乐他人，而且也包括娱乐自己；所谓“娱心”，当然也指在文化氛围比较宽松的环境中，作者能够葆有比较轻松平和的心态，能够随心所欲地抒发思想，或者玩弄技巧。根据这样的观点，前述社科院《中国文学史》所谓元代诗文“题材狭窄”、“充满着个人肤浅的感受、感想”等等的指责和贬抑，显然站不住脚。事实上，娱心也好，娱情也罢，章培恒先生早已将这一评判标准应用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批评。或者说，章培恒先生从“人”、“人心”和“人性”是否解放或解放程度多少这一角度，建立起了全新的文学评判标准。正是因为从这一角度来

^① 《文学与娱心》，载《海上论丛》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衡量和剖析，章培恒先生对于杨维禎及其作品的诠释才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除此之外，由于摒弃了不同文体之间的机械比较和简单描述的文学史写作方式，转而致力于文学演进的梳理研究，元明清诗文的价值（当然也包括研究价值）因此凸显。而在这个历史时期之中，杨维禎就是能够体现这种积极新变的、尤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设《晚明文学研究》的课程开始，一直到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版），章培恒先生对于杨维禎始终十分关注，论述也在不断地深入。

从具体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分析，章培恒先生认为杨维禎的诗论强调的是艺术特征，与南宋严羽“兴趣”说、清初王士禎“神韵”说一脉相承，而与宋诗的“主理”说相对立；杨维禎提倡古乐府，其实是提倡近体诗以外的古诗，至少在客观上含有诗体解放的意味。章先生认为杨维禎的诗歌具有不少离经叛道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张扬自我、肯定与礼教相对立的爱情，以及追求热烈世俗的美。因此杨维禎所反映的，“正是处在上升阶段的市民的审美趣味，在我国诗歌史上是一种新的景观”。^①

从宏观、纵向的角度立论，章培恒先生认为人性或个体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方式和强度变化，体现了文学的演进和新变。章先生认为，作为“追求人性解放”的现代文学

①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第五编《近世文学萌生期》，4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的前奏，中国的近世文学至迟在金末元初就已经开始。因为当时士大夫中的重视个人的意识较前又有所进展，其下层士人进一步与市民结合，士大夫的意识和感情也进一步受到市民的影响，并且从下层逐渐向上层推移，从而使得金、元的人性状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接近于近代的人性：诸如对于个人的欲望（饮食、男女、富贵、享乐等等）的肯定，对于个人意志的尊重，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个体生命力的颂扬。凡此种种，在杨维禎的诗文中均有相应表现，因此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人性状态。^① 换言之，杨维禎诗文的价值，在于它们堪称“现代文学的前奏”。

二、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和评判文学

章培恒先生对于以杨维禎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及其作品作如此深入的研究，对于以杨维禎为代表的元代诗文的历史地位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其实背后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文学史的研究应该而且必须回答文化问题，这是章培恒先生有别于其他文学史家的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曾经有人认为，章培恒先生怀有很深的“五四”情结，表象上看，确实如此。在《晚明文学研究》的课程中，在《元明清诗鉴赏辞典》的序言里，在有关中国古今文学演变的学术研讨会上，他着力阐发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个体意识觉醒和人性解放的生动事例，多次强调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

^① 参见《中国文学史新著·导论》。同上，卷首。

学的渊源关系。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增订本序》中，他不但引用鲁迅先生语录，还摘录郁达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所写的《导言》，努力强调“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是个人的‘发见’”。并且一再声明，追求“人性的解放”的现代文学的前奏曲，早在“五四”以前数百年，也就是在金、元时期已经奏响。

不过，若要追溯章培恒先生“五四”情结的根源所在，其实还是要归结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对于文化建设的热诚。

近些年来，章培恒先生投入主要精力，创办“中国古今文学演变”专业方向，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渊源关系的梳理和研究。简单地说，章培恒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向近现代的演变，是一种必然，如果没有外力的侵入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也必然会向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演变，也必然会出现类似于“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作品，只不过演变的进程可能较为缓慢而已。

为了证明这样的假设完全可以成立，为了告诉人们，中国现代文学并非是“传统断裂”之后的产物，而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杨维桢之类的具有近现代气息的古代作家及其诗文，还有相关的诸如产生原因、发展过程、价值、地位、影响等等，就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和探讨的课题。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断裂”，其实早在二十七八年以前，我们就已经从蒋天枢先生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也就